

中国文化史丛书

神圣殿堂里的悲喜剧

——汉代经学要略

冯良方



沈阳出版社

神圣殿堂里的悲喜剧

——汉代经学要略

冯良方

沈阳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七年

中国文化史知识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张岱年

执行主编

朱立元

委 员

王振复 李祥年 周振鹤 葛剑雄

朱立元 涌 豪

总策划

石铜钧

责任编辑

封兆才 祝乃杰 葛君 田雪峰

封面设计

曾一中 庆芳

目 录

小引	(1)
一、经学曾是老生常谈	(2)
二、从诸子蜂起到儒术独尊	(6)
三、经典提要	(21)
四、通儒硕学董仲舒	(53)
五、二水分流：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	(66)
六、经学的笑话程序变换籤纬化	(74)
七、经学太阳的沉沦	(83)
八、共振：经学与教育、史学和文学	(101)
结语：文化长城	(121)

小 引

一代有一代之学术，代表汉代学术的是儒家经学。然而，那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术，而是先秦主要思想的大总汇，与政治联姻的官学，带有宗教意味的神学。在汉代经学形成和发展中，不仅仅有一部部经典的诞生、注疏和阐释，还有血雨腥风，唾星飞溅，还有钻营跋扈，也有刚正不阿。它使人昏昏欲睡，又使人拍案惊奇。它是当世的显贵，而且后世子孙满堂。因此，就应该了解一下它的模样。

一、经学曾经是老生常谈

经学对于现代中国人而言，也许只是似曾相识，但在中国古代却曾经是一切知识中最起码、最重要的东西。魏晋时期的管辂为何晏说《孝经》“高而不危”及《易经》“谦”、“壮”两卦，何晏就谓之“老生常谈”。^①

正因为经学曾经是老生常谈，所以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就十分显赫，甚至有人认为“经”是中国文化的核心。

那么，什么是经学呢？

要懂得经学，先就要了解“经”。前人曾经把“经”说得很神秘。《释名·释典艺》：“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玉海》四十一引郑玄《孝经注》：“经者，不易之称。”《文心雕龙·宗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孝经序疏》引皇侃说：“经者常也，法也。”如此这般，“经”就成了万世不变的最高真理。

还有一种说法，以为经书是官书。《论语集解序》：“六经

^① 《魏志·方技传》

之策长二尺四寸。《孝经》谦，半之。《论语》八寸。”这正象现代书籍版本各有大小，官书竹简特大，所以称经书。古代竹简大小是否有这些规定，现在无从知晓，但竹简特大的官书何以称为经书，则令人费解。

章太炎先生穷本溯源，破除了笼罩在经书之上的重重迷雾。他说：“‘经’者，编丝缀属之称，异于百名以下用版者，亦犹浮屠书称‘修多罗’。‘修多罗’者，直译为线，译义为经，盖彼以贝叶成书，故用线联贯也。此以竹简成书，亦编丝缀属也。”^① 其实，“经”的本义取象治丝。《说文解字》：“经，织纵丝也。”经乃相对织丝的纬线而言。古代书籍由熟牛皮绳之类贯穿竹简而成，形制颇象纵横交织的纺织物。据说孔子晚年喜好《易》，“韦编三绝”，“韦编”就是熟牛皮穿成的竹简书。因此，“经”就成了书籍的通名。

古籍中最早以“经”称书的记载见于《国语·吴语》“挟经秉桴”，“经”指兵书。另外，《内经》、《难经》是医书；《墨子》一书战国时称《墨经》；《老子》又名《道德经》；佛教、道教等都称自家的经典为“某某经”。

然而，本书所介绍的“经”专指儒家经典。经学专指训释和阐述儒家经典的一门学问。从纯学术的观点来看，儒家经学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从汉武帝开始，儒家经学就成了官学，钦定的权威之学，真正的“国粹”，所以“经”就如上所列被训为“法”、“常”等。从本质上讲，经学是适应中国封建制度需要而产生的，为封建统治服务的，集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精髓核心的经典之学。人们常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主

^① 《国故论衡·文学总略》。

流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就集中体现在经学之中。

经学在中国封建时代是当然的显学。如果翻阅一下中国浩如烟海的古籍，就会发现其中一个处在显要位置的单元——经书。中国最早的一部目录学著作《七略》，后来虽然亡佚，然从本于《七略》的《汉书·艺文志》中尚能见其大概。《汉书·艺文志》首列《六艺略》，六艺就是儒家的六部经典。《六艺略》包括六艺及训释阐述六艺的书籍，共著录了一百零三家，二千一百二十三篇，占《汉书·艺文志》全部作者六百七十七家的百分之十五，全部著作一万二千九百五十一篇的百分之二十四。清代官修的中国最大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经部”亦列于经、史、子、集四部之首，共六百九十三部，占全书总数三千四百三十一部的百分之二十左右；共一万零五十卷，占全书总卷数七万九千二百八十一卷的百分之十三左右。清初人朱彝尊作《经义考》，把他所知的历代经学著作分“存”“阙”“佚”“未见”进行著录，仅写了各书解说，便成书三百卷，还不包括历代湮没无闻的许多著作。这就是历代经学的“累累硕果”，可以说它是古籍中最大的一个门类，单从数量上看，足以使人瞠目结舌，叹为观止。“汗牛充栋”不足以形容，“皓首穷经”绝不是夸张。老生常谈，然又谈何容易！

古人说“穷经为读书之本”。封建统治者要读经，借以支撑封建大厦和装点门面；士人举子要读经，视之为衣食父母或进升阶梯；匹夫匹妇耳濡目染，也会把其中的某些东西作为自己的行为规范、价值观念；即使一些有识之士也要读经，因为他们不得不面对这座“思想文化堡垒”然后才能逾越超升。

冯友兰曾把从董仲舒到康有为一千多年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时期称为经学时代^①。其实不独哲学如此，政治、物理、教育、宗教、历史、文学，乃至风俗习惯，思维方式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形或无形地渗透进了经学的东西。

“经学至汉武始昌明”^②。经学虽可上溯到孔子，但真正成立是在汉武帝时期。以后经学在汉代始终占据要津，致使人们用汉代经学概括汉代的学术文化。而且，汉代经学与以后的经学相比独具形态。故此，汉代经学就有单独讨论的必要。

① 《中国哲学史》上。

② 皮锡瑞《经学历史》。

二、从诸子蜂起到儒术独尊

中国文化发展到两汉出现儒家经学，经历了一个一波三折，由分到合的漫长历程。

“以公元前 500 年为中心——从公元前 800 年到公元前 200 年——人类的精神基础同时地或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开始奠定。而且直到今天人类仍然附着在这种基础上。”^① 这个人类的“轴心时代”或“哲学的突破”时代，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在长达五个多世纪的历史时期，王纲解纽，礼崩乐坏，中国完成了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转型。一方面是战场上的金戈铁马、刀光剑影，政治上的弱肉强食，阴谋迭出；一方面是学术文化上的大自由、大解放，诸子蜂起，百家争鸣，产生了一大批文化巨人，“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诸子百家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有儒、墨、道、法、阴阳五家，它们各具特色又共同奠定了中国人的精神基础。

^① 卡尔·雅斯贝尔斯《人的历史》。

儒家在诸子百家中当坐头把交椅，资格最老，学者最多，著述最丰。儒家有三位巨子：孔子、孟子和荀子。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商民族的后裔，周民族文化的自觉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冯友兰把他比作古希腊的苏格拉底，范文澜说他是封建社会集大成的圣人，皮锡瑞列他为经学的开辟者。的确，在中国文化的词典中，孔子的地位和出现的频率之高无与伦比。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和礼。礼即社会行为规范，讲究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严密细致地规定了每个社会成员的地位、责任和义务。仁即爱人，是孔子学说的精华，在篇幅仅万余字的《论语》中，“仁”出现了一百多次。孔子最大的贡献是将礼与仁协调统一起来。“人而不仁，如礼何？”^①把外在规范的礼转化为个体的内在自觉的仁，是孔子最高的人格境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②，是孔子最高的政治理想，换言之，在文化秩序之上建立政治秩序，而绝不能相反。孔子学说有浓厚的复古色彩，中庸调合机制，主张在不打破宗法血缘关系网络的基础之上建立一个安定团结的社会体系——文武周公之治那样的“理想国”。

孔子之后儒分为八，战国中期儒学的代表是孟子。孟子是孔子的第四代门徒，儒学的正宗传人。孟子发展了孔子的仁义学说，主张人性善，仁政王道，区分义利之辨。其学说体系中最闪光之点是民本思想和高扬个体人格。他提出“民

① 《论语·八佾》。

② 《论语·为政》。

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①，把暴君比作独夫，人人得而诛之。他又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②，“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③。孟子鲜明的轻君重民意识，卓尔不群的君子人格在封建专制时代有独特的价值。宋代理学推尊他为亚圣，孔孟之道成为儒学的代名词。

荀子是战国后期的儒学大师，他发展了孔子学说中的礼，主张人性恶，法后王，天人之分等。他的天人之分闪烁着朴素的唯物论光芒，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一整套社会制度论，经其弟子韩非、李斯的发挥和在政治实践中的运用，成了建构封建专制主义大厦的理论基石。

与儒家同为春秋战国的显学的是墨家。“孔子是古代文化的辩护者，辩护它是合理的，正当的，墨子则是它的批判者。孔子是文雅的君子，墨子是战斗的传教士。”^④ 墨学有浓厚的平民色彩，侠士风度，墨学门徒甚至有类似伊斯兰教那样的宗教军队合一的组织。其理论体系包括天志明鬼，尚贤尚同，强本节用，兼爱非攻等内容。其学说严密的逻辑和实证手段，以及自然科学和工艺技术方面的知识，在偏重体悟轻视分析、关切现实人生的中国文化品格之外独树一帜。

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是战国时期的老子和庄子。老子学说属“君人南面之术”^⑤，庄子学说属艺术人生哲学。老庄虽

① 《孟子·尽心下》。

② 《孟子·滕文公下》。

③ 《孟子·告子上》。

④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⑤ 《汉书·艺文志》。

然有别，但在很多方面都有相通之处，如同样使用“天道”、“无为”、“阴阳”、“有无”等范畴，具有朴素辩证法精神，共有一种反文明的倾向和隐士风度。庄子学说中最有价值的是审美观照和对绝对自由精神境界的追求。

法家分法、术、势三派，法即法令、政令；术即策略、手段；势即权势、权威。战国后期的韩非则溶三者于一炉，集法家之大成。法家以犀利的笔法、严密的逻辑，论证了人与人之间冷酷无情的利害关系，揭露了儒家“美丽的回顾”——“法先王”的虚伪，展示了带血的历史进化。

阴阳家的代表人物是战国时期的邹衍。把古老的阴阳同五行学说结合起来，用于人事社会的解释是阴阳家的一大创造。邹衍认为阴阳消长的结果，体现为五行相生，循环运转。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土克水，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各个朝代代表一德并有符应，如虞土、夏木、商金、周火等。五行同时空相配，如东方和春天相配，由木主持，等等。邹衍还有“九州”之说。总之，合天地人于阴阳五行的有机系统之中。

从对这五家思想的匆匆巡礼中，可以见出春秋战国时期学术思想的异采纷呈，争奇斗妍，恰如《汉书·艺文志》所言：“五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

诸子百家虽然“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但“譬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① 诸子之间的互相影响、交合乃至兼容，在战

① 《汉书·艺文志》。

国后期越来越明显。相传为子思所作的儒家经典，把孔子推尊为通天教主，是受训了墨家的刺激，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是吸收了道家的影响。荀子虽为儒家，却兼采百家尤其是法家思想。韩非不仅集法家之大成，而且“在道家有其渊源，在儒家有其瓜葛”，“与墨家通了婚姻”^①，还与兵家有不解之缘。然而这只是学派之间的互相沟通，平等的互相取舍。一旦政治同学术挂钩，就必然打破这种缓慢的融合，加速甚至改变倾向某一学说的学术走向。

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结束了二百六十年的战国时代，终于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千秋大业，建立了第一个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王朝。政治的大一统要求文化大一统从理论的或然性前途预测，诸子百家尤其是以上介绍的五家都有可能在吸收别家之后跃居统一天下的指导思想地位。

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顺时应世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文化专制、统一的政策，如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等等，这些都相当成功。但是，在对待思想文化的精髓——诸子学说的时候，却出现了严重的偏差。本来在秦始皇即将兼并六国之时，丞相吕布韦组织门客编纂了一部兼有儒、墨、道、法、兵、阴阳、纵横等综合数家，博采众长的杂家著作《吕氏春秋》，它似乎表明应当以此来作为统一王朝治理天下的理论基础。可是随着吕布韦权力野心膨胀到危及秦王嬴政的统治地位而最终被迫饮酖而亡之后，因人废书，秦始皇就选择了法家学说。然而秦始皇选择法家有更深刻的历史因素，秦国的

① 郭沫若《十批判书》。

几代雄主均倾向法家，法家思想在秦国树大根深，曾经使秦国从一个偏远的西方小国后来居上，最终一统天下。秦孝公任用法家商鞅变法，秦国魔术般地从此富强起来；秦始皇还是秦王之时，读到韩非的著作，说：“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乎！”^①大加激赏，引为知音，不惜发动战争，把他弄到手。而辅佐秦王当上始皇帝的李斯正是一位法家人物。统一天下之后，秦始皇变本加厉地片面实行法家学说，突出的表现就是臭名昭著的焚书坑儒。

秦朝建立之初，朝廷设立博士一职，掌古今史事待问及书籍典守，是高级的学术顾问。博士的名额多至七十人，诸子百家包括儒家都可立为博士。博士教授弟子，甚至参与政事讨论，跟随秦始皇出行。儒生在秦初曾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封建最高统治者被尊为“皇帝”，皇帝之命称为“制”，令称为“诏”，自称为“朕”，就是嬴政采纳丞相李斯等大臣及一些儒学博士的建议而成。公元前 219 年立在泰山顶上的颂德碑，出于儒学博士及鲁地儒生手笔，始皇行封禅大典也请儒生讨论过。然而，公元前 213 年，儒学博士淳于越建议始皇效法商周的分封制，与秦所推行的郡县制大相径庭，同李斯等法家唱对台戏，遭到了李斯的竭力反驳，儒家同法家的合作从此破产。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之十日不烧，为城旦。所不去者，

① 《史记·韩非列传》。

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①这次焚书，虽然朝廷所藏之书以及民间的“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不在毁灭之列，但学术垄断于官府，思想自由受到钳制，从此春秋战国繁荣的学术局面宣告结束，儒家学派也遭受了一切重大的打击。其实，焚书的理论并非李斯独创，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韩非早就说到过，所以始皇李斯焚书是法家成为统治思想的必然结果。焚书后的第二年，由于为始皇求仙药的方术之士多次使他失望，方士侯生、卢生甚至不满他的刚戾自用，严刑酷法，居然逃之夭夭。始皇一怒之下，将“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被活埋的方士之中，有不少是儒士，这两件事加起来就是“焚书坑儒”。儒学这次比上次受到的打击更加惨重，以古非今连脑袋也保不住了。

凭借粗暴的行政命令和血腥的武力镇压，要想消灭有生命力的学术文化，永远不可能办到，正如剪除的韭菜，阳光土壤一旦适时就会重新蓬勃地生长起来。秦末天下大乱，除参加打仗的军人之外，最忙碌的恐怕就要算儒士了。陈涉起义不久，孔子的七世孙孔鲋就抱着儒书去投奔，并当上了博士。其它儒生都纷纷投靠推翻暴秦的各路诸侯豪杰。司马迁对此解释到：“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②秦王朝短短十五年就寿终正寝，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思想文化政策上的失误，崇法禁儒，是更深层次的根源。

汉高祖刘邦出身于下层平民，生性不喜欢儒术。他曾经

①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 《史记·儒林列传》。

把儒者的帽子抓下来当众往里撒尿，一副流氓无赖的嘴脸。不过他并没有把儒生统统赶跑。当上皇帝以后，刘邦第一次感到儒生有用，是叔孙通为他制朝仪。当年那些同刘邦打天下的将军们，多是自己的朋友老乡，同刘邦一样不通文墨，在皇宫里酒足饭饱以后，放声高歌，拔剑击柱，乱糟糟的一团。刘邦觉得不成体统，但又想不出办法加以约束。秦时即为博士后来跟随在刘邦身边早就想找机会升官发财的儒生叔孙通，趁势请求制定朝见皇帝的仪式——“朝仪”，得到了刘邦的首肯。叔孙通特地到儒家学派的发祥地曲阜，招集三十余位儒生，连同自己的学生一百多人，紧锣密鼓地制定规章，加以演习。一个月后，再集合大臣将军们演习。公元前200年，长安宫落成，诸侯群臣都来朝拜，正式启用“朝仪”。文武官员分两班跪坐，刘邦乘着辇车缓缓驾到，文武官员按职位大小为序，一一致词祝贺。“至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然后设立酒法，文武官员俯身仰头，依次为刘邦敬酒祝寿，最后宣布酒宴结束。御史执法将那些动作不合规矩的人统统赶出殿外，于是整个宴会无人敢喧哗吵闹。刘邦喜出望外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叔孙通官拜太常，赐金五百斤，弟子们说：“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这套显示君尊臣卑的繁琐滑稽的仪式表演从此进入宫廷，儒家的神通也体现出来了。^①

使儒学成为汉代统治思想的不是叔孙通那样的陋儒，而是陆贾等真正的思想家。陆贾曾经常常在刘邦面前称说《诗》、《书》，刘邦洋洋自得而且颇不耐烦地说：“乃公居马上

① 参见《史记·叔孙通列传》。